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汗簡》、《古文四聲韻》 新證

王 丹／著

《汗簡》和《古文四聲韻》這兩部傳鈔古文字書，自宋代成書後，研究者對其評價一直貶褒不一。但近幾十年來，隨着戰國文字研究的興起，及大批量戰國簡帛資料的發現和出土，兩書也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和重視。

本書主要立足於古文字的角度，將《汗簡》和《古文四聲韻》所收傳鈔古文放在出土古文字資料的背景下，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與出土古文字進行形體方面的互證。目的在於明確它們的來源、性質和結構，以及書中傳鈔古文自身存在的一些情況，如異體、通假、同義換讀等，恢復它們的本來面貌，為正確理解、充分利用這批寶貴的傳鈔古文材料作出努力，為古文字的研究提供更加豐富可靠的資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汗簡》、《古文四聲韻》 新證

王 丹／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 / 王丹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2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ISBN 978-7-5325-7870-2

I. ①汗… II. ①王… III. ①漢字—古文字學—研究
IV. ①H1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03587 號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

王 丹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11.5 插頁 2 字數 184,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870-2

H·138 定價: 39.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承印公司調換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09JZD0042）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

叢書前言

“出土文獻”是與“傳世文獻”相對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始於漢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兩千多年裏，出土文獻層見疊出，研究工作不斷走向深入。孔壁中經、汲冢竹書、商周金文、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發現，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那個時代的學術生態。

1925年，清華研究院的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首倡“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他所謂的“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獻。通過出土文獻來印證補正傳世文獻，開闢研究中國古史的新途徑，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真諦。“二重證據法”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對近代學術的影響至為深遠。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境外搶救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總數約2500枚，其中有多種經、史典籍，非常珍貴，其重要性堪與孔壁中經、汲冢竹書相媲美。9月，清華大學成立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過開展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討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研究的前沿課題，把中心建設成為具有世界領先水準的出土文獻研究和保護中心。當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對清華簡進行保護、整理與研究，同時開展其他出土文獻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別是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領導的肯定和學術界及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2011年4月，在清華百年校慶前夕，中心領銜申報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2年5月，為回應教育部2011計劃，中心聯合國內11家兄弟單位組織籌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內，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經歷了跨越式的發展，在領導的關懷支持和同人的集體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處仍然是明顯的。我們的學識經驗都很有限，面對任務的要求，時時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們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幫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發展，我們始終圍繞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這個主旋律。

為了集中展示近年來出土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輯了這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叢書將陸續推出，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單位人員，都是活躍於一線的中青年學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獻時間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相當寬廣，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當今出土文獻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廣大讀者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啓示。

這套叢書的編輯，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積極回應，更有幸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李學勤

2013年10月

目 錄

緒 論	1
第一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的內容、體例和性質	1
第二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的研究概況回顧	3
一、研究者對《汗簡》、《古文四聲韻》的評價	3
二、過去的研究方法	6
第三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的來源及相關研究 材料	12
一、書中傳鈔古文的來源	12
二、相關的研究材料	15
第四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的研究意義	17
第五節 寫作意圖與研究方法	18
一、寫作意圖	18
二、研究方法	19
上編 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重點字的考察	21
第一節 利用新出材料及研究成果證成舊說	22
第二節 利用新出材料及研究成果糾正舊說	44
第三節 對舊說未涉及的古文字形進行分析	68
下編 對《汗簡》、《古文四聲韻》中重文關係的考察	139
第一節 構形關係	139

一、異寫關係	140
二、異構關係	142
第二節 假借關係	153
第三節 同義換讀	158
第四節 誤置與誤寫	161
結 語	165
主要參考文獻	167
引書簡稱表	169

緒 論

第一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的內容、體例和性質

古文，是含義相當廣泛的概念。我們通常稱“殷周古文”、“晚周古文”、“秦漢古文”等，這是指與隸書相對而言的廣義“古文”，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古文字”。而狹義的“古文”，則是指以《說文》古文為主，包括其他諸如石經古文、《汗簡》古文等轉鈔於戰國文字的字體。^①

我們所要談到的傳鈔古文大致相當於上面所說的狹義的“古文”，“是指歷代輾轉摹寫移錄流傳至今的戰國古文資料，其中雖不免譌別詭更之類，而與出土戰國文字實為一家之眷屬”。傳鈔古文的資料比較龐雜，大致包括“《說文》古文，石經古文，《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中之古文，《玉篇》、《一切經音義》、《篆隸萬象名義》、《龍龕手鑑》、《類篇》、《集韻》等字書所錄古文”。^②

《汗簡》，七卷，宋郭忠恕撰。北宋初年，國子監主簿郭忠恕將當時流傳於世的古文字兼收並蓄，集成了一部按《說文》部首編排的古文字典——《汗簡》。書中每字先列古文，下注楷字與出處，而古文與其下楷字之間除形體相符的之外，還包括異體、假借、同義換讀及誤置等多種關係。書名取自古人所謂“殺青書簡”，用來標明書中古文淵源所自，主要是來源於古代寫在竹簡上的文字。書中徵引古書、碑刻等資料共七十一種，來源豐富，少者僅採其中一字，多者數百字，鄭珍在《汗簡箋正》^③中專門單列一卷，對《汗簡》

① 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中華書局，1986年，106頁。

② 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山大學中文系，1999年，857頁。

③ 鄭珍《汗簡箋正》，《鄭珍集·小學》，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467～499頁。

古文下所注出處進行了一番全面梳理,其中有些書目與實際有一定出入。除《說文》、石經、《碧落文》三種外,《汗簡》中所引書目早已散佚,今日已無法見到。

《汗簡》在宋代成書後,流傳不算太廣。北宋李建中(945—1013)曾對此書作過“刊修”,是最早流傳開來的鈔本,即“秘閣新本”;真宗天禧二年(1018),復經李直方轉鈔。現在流傳的兩個本子清初馮舒藏鈔本和朱彝尊藏鈔本,均源自李直方轉鈔本。我們所用李零、劉新光整理的《汗簡》,即《四部叢刊》影印的馮舒本。

《古文四聲韻》,五卷,宋夏竦撰。此書在《汗簡》的基礎上,更廣泛地搜集古文材料、擴大收字範圍編撰而成,其徵引古書、碑刻等資料包括《汗簡》在內計九十八種,收字亦多出隸古定這種依《汗簡》體例不能採用的字體。這是宋代體例與《汗簡》相異的又一部重要的古文字典。《古文四聲韻》以《切韻》四聲爲綱分爲五卷,卷內以中古二百一十韻部(與《廣韻》稍有差異)繫字,與《汗簡》互爲補充。“以韻分字,而以隸領篆”(《四庫全書總目》語),楷體字頭之下收古文或隸古定形體,其數少者一二,多者數十個,“形多頭羸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古文四聲韻》序)。這些古文與楷書字頭及古文與古文之間,除形體相符之外,亦包括異體、假借、同義換讀、誤置以及正體與俗字、譌字等多種關係。

《古文四聲韻》在宋代曾正式刻印,較《汗簡》流傳廣泛。以前人們所用的本子主要有三個:一是乾隆四十四年汪啓淑一隅草堂刻本,二是光緒八年《碧琳琅館叢書》本,三是羅振玉石印本。後兩個本子均據汪本,來源相同。汪本是根據西陂宋氏藏汲古閣影宋鈔刻印,汲古閣本據說又是根據文淵閣宋刻原本。汲古閣本現在下落不明。^①我們所用李零、劉新光整理的《古文四聲韻》,即北京圖書館藏宋刻配鈔本。此本與其他傳本的異同見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古文四聲韻》的出版後記。^②

“像《汗簡》、《四聲韻》這類廣徵博引的古文字典,其所收古文本來就不會是有系統結構的文字。多頭的來源導致這些古文,無論從時間或空間上都不能統一。換言之,這些文字既有時代較早的,也有時代較晚的;既有從碑刻、竹簡移錄的,也有從紙本轉鈔的。”^③這兩部書中所收古文雖然十分龐

① 李零、劉新光《汗簡/古文四聲韻》,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後記7頁。

② 李零、劉新光《汗簡/古文四聲韻》,出版後記7~9頁。

③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70頁。

雜,但是,“一部‘古文’字書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它與‘古文’的流傳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追溯先秦‘古文’流傳至唐宋的大致脈絡,《汗簡》中‘古文’的來源及該書的形成就不難理解了。”^①

我們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整理後,與出土古文字和傳世字書全面對照,書中傳鈔古文的多頭來源就梳理清楚了,其性質也就逐漸明朗了。從歷時角度看,書中古文時間跨度較大,既可以上溯到字形較為原始、古樸的甲骨文、金文,又可以在唐宋碑刻、楷書中找到它們的影子。從共時角度看,它們包含了同一時期、不同漢字形體的多種異體。那麼,它們就是上承殷周古文,下至篆隸真楷,以戰國文字為主的傳鈔古文材料。

第二節 《汗簡》、《古文四聲韻》的研究概況回顧

一、研究者對《汗簡》、《古文四聲韻》的評價

北宋郭忠恕所著《汗簡》和夏竦所集《古文四聲韻》以《說文解字》和魏正始石經作基礎,進一步擴大搜集當時存世的其他一些字書、寫本和石刻,彙輯其中的古文字體編寫而成。但自宋代成書後,它們的流傳並不算太廣,宋以後的古文字學家也往往不太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兩書所採用的那些古文材料後人大多見不到,無從核對其可靠性;二是其所收字體與宋以來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所謂“真古文”)也有很大區別(吾丘衍《學古編》)。特別是清代以來,《古文尚書》辨偽的大案在當時造成巨大影響,加之考據學家們尊崇許學,他們不大相信《說文》外還會有多少真正的古文流傳下來。”^②

最早對《汗簡》一書進行系統研究的,當屬清代著名小學家鄭珍,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甄別《汗簡》古文來源、闡發郭書價值、訂正前人譌失等^③。但在學者們尊崇《說文》並對其所載古文深信不疑的時代,他著《汗簡箋正》的動機也是通過批判《汗簡》維護《說文》在中國傳統文字學中的地位。但晚清也有很多學者利用二書中的傳鈔古文字形對甲骨文、金文等做過考釋工作,如吳式芬、陳介祺、劉心源、方濬益、孫詒讓等,雖然其中正誤並

①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自序9頁。

② 李零、劉新光《汗簡/古文四聲韻》,出版後記4頁。

③ 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58~863頁。

現,但他們的工作卻證明了傳鈔古文的存在價值。晚清七十年間,學者們研究傳鈔古文的是非得失、經驗教訓,可參看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①一文。我們在研究古文字時仍值得借鑒。呂大臨在《考古圖釋文》中曾這樣評價過二書:“孔安國以伏生口傳之書訓釋壁中書,以隸古定文,然後古文稍能訓讀。其傳於今者有《古尚書》、《孝經》、陳倉石鼓,及郭氏《汗簡》、夏氏《集韻》等書尚可參考。”^②呂說較為客觀公正。民國時期,沈兼士、唐蘭等卻仍持懷疑態度。沈兼士說《汗簡》“其取材皆蕪濫,不足據為要典”^③。唐蘭認為:“從漢到宋初,除了篆籀和竹簡古文外,祇有杜撰的古字了。郭忠恕作《汗簡》,是這一個時期的結束。”^④“夏竦本意是集錄這些材料以備研究鐘鼎文字,但結果這些材料,大抵不能用。”^⑤

直到20世紀初,國學大師王國維率先運用“二重證據法”,證明古文一系的材料與戰國文字為“一家之眷屬”。甲骨、銅器、古陶、璽印、貨幣、簡帛等文字大量發現,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長沙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信陽長臺關、江陵望山等地大批竹簡相繼出土,其中很多利用出土古文字難以考釋的字,卻借助《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得以解決。因此,學者們對二書越來越重視,對其學術價值重新作出評價,並且呼聲高漲。李學勤在80年代曾這樣評價《汗簡》:“近二十餘年來,在古文字學中興起了一個新分支,即戰國文字研究,六國‘古文’的奧蘊逐漸被重新揭示。通過戰國文字研究開展,前代‘古文’之學得到重新評價,《汗簡》真實價值也為人們所認識。過去王國維先生指出《說文》‘古文’係六國文字,現在我們不妨說《汗簡》‘古文’確以六國文字為其本源。”^⑥本世紀初,再次提出:“由最近的簡帛文獻研究,我們忽然從戰國文字又發現了歷史上的‘古文’之學。……更多受到注意的也是現在普遍受到尊敬(這與清代、民國時期完全不同)的是《汗簡》和《古文四聲韻》,《汗簡》和《古文四聲韻》實際上是五代到北宋之間對前世的‘古文’之學的一個最後總結。可到了北宋以後,由於青銅器金文研究地位的上升,大家的目光都注意到商周古文字了,對於

① 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857~881頁。

② 呂大臨《考古圖釋文》,《宋人著錄金文叢刊》,中華書局,1987年,271頁。

③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67頁。

④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齊魯書社,1981年,39~40頁。

⑤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360頁。

⑥ 李學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73頁。

《汗簡》和《古文四聲韻》這樣的‘古文’之學就不那麼重視了，甚至加以貶低了。現在我們忽然覺得其重要性了。”^①張頴也指出“今天對《汗簡》一書似有重新估價的必要”^②。近年來，祇要提起研究《汗簡》、《古文四聲韻》的著作，莫不首推黃錫全的《汗簡注釋》^③。至今所見對《汗簡》中的傳鈔古文作過全面研究的專著也僅此一部，該書又每每將《古文四聲韻》與《汗簡》中的字形對比分析，互相補充。其他研究二書的成果則多是單篇論文，雖然研究角度不同，但目的都在於證明書中傳鈔古文的重要價值。

總體來說，《汗簡》、《古文四聲韻》在中國傳統文字學的發展長河中經歷了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過程。前輩學者對二書有貶有褒，貶之者認為書中古文來歷不明，上不合於商周，下有悖於《說文》，非“真古文”；褒之者認為二書是漢以後輯佚傳鈔古文的集大成者。起初，二書被貶得太低，而後來贊者又呼聲過高。但這種情況也是可以解釋的，正如前面所分析過的那樣，宋代時青銅器大量出土，成為當時研究的焦點，接觸商周金文的學者數量超過前人，戰國古文逐漸被忽視。而且《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古文的出處多已無從核實，大家覺得古文上不合鐘鼎款識，下不同《說文》篆體，懷疑它出於杜撰。繼而受晚清疑古思潮的影響，加上當時《說文》學大盛，對二書持批判否定態度的學者，肯定會受到那個時代學術風氣的影響和局限，“門戶之見”極其嚴重。但半個世紀之後，地不愛寶，出土了大量的實物資料，特別是載有戰國文字的竹簡，使學者們跳出了前人的那個時代局限，並開始在佔有更多第一手材料的情況下，將地下出土文字和傳鈔古文結合起來研究，互相補充，多有創獲。人們發現二書中的古文雖不合於甲金文和《說文》，卻與戰國竹簡文字每每冥合，開拓了傳鈔古文研究的新景象。反過來想一下，如果宋代和晚清學者在當時也能見到今天如此豐富的戰國簡帛、古陶、璽印、貨幣等材料，他們的研究成果絕不亞於後人。今天的學者多能客觀地評價《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他們認為書中的錯誤既有作者自身認識的問題，也有時代的局限性。“郭忠恕處於那種先秦‘古文’幾乎逸盡、託古之風盛行的時代，受當時文字水準、鑒別能力的局限，他本人受到一定的影響，並在該書中收進了一些偽字、錯字、或者後世俗體，是不可避免的；《汗簡》成書

① 李學勤《李學勤先生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會議閉幕式上的演講》，《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1頁。

② 張頴《中山王鐸器文字編》，中華書局，1981年，序5頁。

③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已千有餘年，經‘刊修’、傳鈔、翻刻，其中有後人竄改、遺漏、錯誤的地方也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都是我們今天需要仔細加以分辨、糾正和清除的。”^①“關鍵是我們必須對這些材料有真切的理解，有區別地加以對待，有條件地加以運用。”“今天我們實事求是地評價《汗簡》，就要認真分清其中的精華與糟粕，既要看到它積極的東西，又要看到它存在的問題，這纔是科學的態度。”^②曾憲通的此段評價也非常中肯。我們在以後的研究中，就要以這種審慎的態度去利用《汗簡》和《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材料，從而更好地發揮它的價值。

二、過去的研究方法

前面已經提到，從 20 世紀 50 年代至今，地下新材料不斷被發現，特別是戰國簡帛資料的大量出土，引起了衆多學者對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字關係的理性思考，他們利用出土古文字和傳鈔古文互證的方法，從不同角度來研究二者的關係。

（一）從文字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晚清學者利用《汗簡》、《古文四聲韻》考釋甲金文已有不少成果，如前面提到的吳式芬、陳介祺、劉心源、方濬智、孫詒讓等，陳偉武《試論晚清學者對傳鈔古文的研究》一文有較為詳細的舉證和分析，茲不贅述。近幾十年來，這種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和成果有增無減，翻檢《甲骨文字詁林》、《金文詁林》、《戰國古文字典》、《古文字詁林》、《古文字譜系疏證》這些大型工具書，便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例如《金文編》^③中就有 20 餘處引用了《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字形。特別是包山、郭店、上博等大宗竹簡出土和發現之後，利用《汗簡》、《古文四聲韻》考釋古文字的例子更是觸手可及。

朱德熙《釋𣎵》一文考訂出甲金文中的“𣎵”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戚”下所收傳鈔古文𣎵、𣎵、𣎵類形體均為“就”字，就（從紐覺部）、戚（清紐覺部）二字聲音相近，所以，卜辭及傳鈔古文中以“𣎵”、“𣎵”類形體為“戚”

① 黃錫全《汗簡注釋》，自序 22～23 頁。

② 曾憲通《是對〈汗簡〉做出正確評價的時候了——讀〈汗簡注釋〉有感》，《曾憲通學術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2002 年，13 頁。

③ 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 年。書中提到《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傳鈔古文字形的字頭編號有 0136、0244、0399、0558、0686、0706、0713、1552 等。

者均出於假借^①。王輝重申朱德熙的觀點，並利用新出郭店簡《六德》“聖與智𠂔𠂔(矣)，急(仁)與宜(義)𠂔𠂔(矣)，忠與信𠂔𠂔(矣)”中的“就”字，以及《五行》“兌(悅)則𠂔𠂔則新(親)”、“不兌(悅)不𠂔𠂔不新(親)”、“𠂔𠂔而信之，新(親)”中讀為“戚”的“就”字，證明鄂君啓節中的𠂔𠂔應釋為“就”^②。《戰國文字研究(六種)·智屢考》一文據《汗簡》、《古文四聲韻》“婁”字下所收古文𠂔𠂔、𠂔𠂔，釋仰天湖𠂔𠂔、𠂔𠂔及信陽簡𠂔𠂔、𠂔𠂔類形體為“婁”^③。這些考釋觀點已可視為定論。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从“昆”的字》據《汗簡》、《古文四聲韻》“昆”、“混”字下所收古文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考訂出郭店簡《六德》“為𠂔𠂔弟也，為妻亦𠂔(然)”、“為𠂔𠂔弟絕妻，為妻絕𠂔𠂔弟”中的𠂔𠂔類形體應釋為“昆”。其他一些从古文“昆”的字如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現在也都得到了正確的認識，分別為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④。趙平安師《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綰”和“綰”——兼及𠂔𠂔、𠂔𠂔的形體來源》一文又對此類形體的複雜來源進行了分析^⑤。

李學勤《論𠂔公𠂔及其重要意義》一文結合包山簡“𠂔”字和《汗簡》、《古文四聲韻》“隨”下古文𠂔𠂔、𠂔𠂔等形，釋“𠂔山濬川”的首字為“隨”，而𠂔𠂔、𠂔𠂔等“改从‘𠂔’為从‘左’，大約是因為‘左’在精母歌部，‘隨’在邪母歌部，古音相近”^⑥。

趙平安師《上博簡〈三德〉“毋𠂔貧”解讀》據《汗簡》、《古文四聲韻》、三體石經“𠂔”字下所收古文𠂔𠂔、𠂔𠂔、𠂔𠂔，釋《三德》“毋𠂔貧”中第二字為“𠂔”，讀為“𠂔”。並上溯到甲骨文𠂔𠂔，推斷𠂔𠂔下部所从的“𠂔”當由“大”寫譌，而𠂔𠂔、𠂔𠂔等形下部所从的“夫”由“大”變來。^⑦

《九店楚簡》考釋部分根據包山簡中同用為人名的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和《古文四聲韻》“達”字所引《古老子》𠂔𠂔，將“是胃(謂)𠂔𠂔日”中的第三字釋為“達”^⑧。何琳儀《郭店簡古文二考》亦據𠂔𠂔釋郭店簡𠂔𠂔、𠂔𠂔類形體為

① 朱德熙《釋𠂔》，《朱德熙文集》第5卷，商務印書館，1999年，1頁。

② 王輝《釋𠂔、𠂔》，《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2000年，146～149頁。

③ 朱德熙《戰國文字研究(六種)·智屢考》，《朱德熙文集》第5卷，36～37頁。

④ 李家浩《楚墓竹簡中的“昆”字及从“昆”的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06～317頁。

⑤ 趙平安《釋曾侯乙墓竹簡中的“綰”和“綰”——兼及𠂔𠂔、𠂔𠂔的形體來源》，《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14頁。

⑥ 李學勤《論𠂔公𠂔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⑦ 趙平安《上博簡〈三德〉“毋𠂔貧”解讀》，簡帛網，2007年1月1日。

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87頁。

“達”字^①。

此外，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②、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③、《〈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義雲章〉“古文”的研究》^④、姜允玉《中山王銅器銘文中所見的傳鈔古文》^⑤、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⑥等從整體上利用出土古文字與《汗簡》、《古文四聲韻》中的傳鈔古文進行對比分析，均得出與王國維“古文一系的材料與戰國文字為‘一家之眷屬’”類似的結論。

陳焯湛《碧落碑研究》分析碑文書體與字形，研討了其用字特色^⑦。江梅《碧落碑研究》也對碑文進行了整理和注釋^⑧。楊慧真《〈汗簡〉異部重文的再校訂》利用漢字形、音、義相結合的特點，對《汗簡》異部重文進行了周遍性考察，基本廓清了《汗簡》異部重文的真正面目^⑨。國一姝《〈古文四聲韻〉異體字處理譌誤的分析》從異體字整理的角度對釋字與其所領被釋字的非異體關係（包括通假和誤釋）進行考析，並據出土古文材料分析字形譌誤情況^⑩。

近年來，郭店、上博等大批量戰國楚簡資料的研究熱潮持續不衰，《汗簡》、《古文四聲韻》這份傳鈔古文資料也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利用其中的傳鈔古文與出土古文字互證，已成為古文字學領域研究的一個主要趨勢。學術界在借助《汗簡》、《古文四聲韻》考釋古文字的同時，也利用一些新材料來考辨傳鈔古文的來源及流變過程中發生的譌失。

（二）從音韻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汗簡》、《古文四聲韻》雖然以收錄古文字形為主，但也有釋音者，並且後者是以古聲韻體例編排成書的。所以，一些學者開始從音韻學的角度研

① 何琳儀《郭店簡古文二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5期。

② 何琳儀《戰國文字與傳鈔古文》，《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19～126頁。

③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說文〉“古文”的研究》，《古文字論叢》，藝文印書館，1988年，433～464頁。

④ 黃錫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石經、〈義雲章〉“古文”的研究》，《古文字論叢》，465～468頁。

⑤ 姜允玉《中山王銅器銘文中所見的傳鈔古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2004年，236～242頁。

⑥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研究叢刊》第二輯，綏裝書局，2007年。

⑦ 陳焯湛《碧落碑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

⑧ 江梅《碧落碑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⑨ 楊慧真《〈汗簡〉異部重文的再校訂》，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

⑩ 國一姝《〈古文四聲韻〉異體字處理譌誤的分析》，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

究它們。

王國維《書〈古文四聲韻〉後》討論了《古文四聲韻》與《唐韻》、《切韻》等分韻情況的個別異同之處^①。

呂朋林《〈汗簡〉音切考校(上)》、《〈汗簡〉音切考校(下)》將《汗簡》中四百多條音注與《廣韻》反切作比較,以幫助人們認識《切韻》音系和《廣韻》的性質^②。

周祖謨《〈新集古文四聲韻〉與〈集古文韻〉辨異》舉例分析了中華書局影印的《古文四聲韻》與其後附印的《集古文韻》的差異,如二者名稱不同、上聲分韻多寡不同、韻次也不同意^③。

王丹《〈古文四聲韻〉重文間的關係試析》一文中也列舉了書中具有假借關係的古文,如焉—𠂔(H67a)、性—𠂔(G4.36b)、干—𠂔(G1.37b)等,並以同時期出土文獻或傳世文獻中的假借用例,與之相印證,同時反映出了上古音的一些規律^④。

音韻學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如一些韻部的分合、韻內字的歸屬等,這都有待於學者們的進一步研究。

(三) 從訓詁學的角度進行研究

訓詁學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書中具有同義換讀關係的古文之間,“有時候,人們不管某個字原來的讀音,把這個字用來表示意義跟它原來所代表的詞相同或相近的另一個詞(一般是已有文字表示的詞)。這兩個詞的音可以截然不同”^⑤。這是不同於假借和形借的一種義借現象,是意義相同而寫了別字。但這種“義借”關係卻有助於我們對某些古文意義的理解。

王丹《〈古文四聲韻〉重文間的關係試析》一文中曾分析過一些具有同義換讀關係的古文。如丹—彤(G1.37b)、圓—𠂔(H33a)、禍—袂(G3.21b),等等^⑥。徐在國《談隸定古文中的義近誤置字》將此類情況看作是義近誤置

① 王國維《書〈古文四聲韻〉後》,《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83頁。

② 呂朋林《〈汗簡〉音切考校(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1期;呂朋林《〈汗簡〉音切考校(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2期。

③ 周祖謨《〈新集古文四聲韻〉與〈集古文韻〉辨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1期。

④ 王丹《〈古文四聲韻〉重文間的關係試析》,《漢字研究》第一輯,學苑出版社,2005年,241~242頁。

⑤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219頁。

⑥ 王丹《〈古文四聲韻〉重文間的關係試析》,《漢字研究》第一輯,242~243頁。